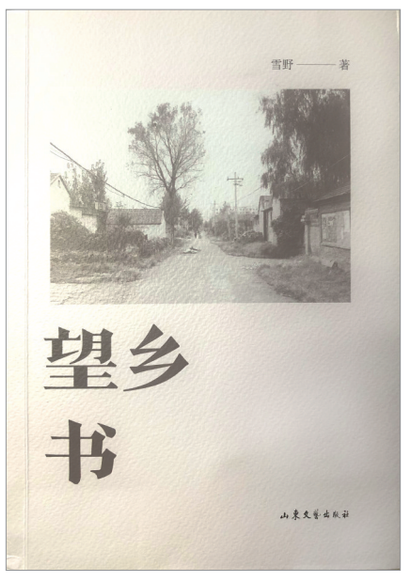
# 手写故乡的人

□迟子建

齐鲁大地有个西王善村，1985年秋天，有个男孩出生在一户姓吕的人家，他是吕氏二十二世传人。这个男孩家族的祖辈，无论是爷爷还是姥爷，都是饱学诗书之人，奶奶和姥娘虽然文化不高，但她们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善良、隐忍、勤劳。他的父母平平凡凡，但识大体、懂感恩。可以说，这个男孩出生在好的土壤中，这个土壤既包含了自然的土壤，也包含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人文土壤。爷爷给他取名“吕震”，但父亲为他报户口时，派出所的户籍警为图方便，随手写成“吕振”。在我看来，舍“震”取“振”，也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温柔眷顾：“震”阵仗太大，而“振”内敛得多。拥有这样的“振”，既低调，又昂扬向上，实在得感激那位懒得写繁复笔画“震”的户籍警。

吕振在西王善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之后随父母进城，和这个年代出生的孩子一样，受到良好教育，虽然初次高考失利，但复读一年后，考上了青岛大学，毕业后做了编辑，又考取山东大学研究生，再之后考上公务员，进京成了国家某机关的一名公职人员。可以说，以吕振目前的年龄，他从一个小小的西王善村起步，得天地厚爱，靠着个人努力，一路走到今天，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因为不是所有的时代都能人尽其才的。

吕振爱好文学，自上学起就对数理化不感兴趣，偏爱语文，很早就在校刊发表作品，文学是他生命的灯。就像他在作品中写的那样，元宵节时，姥娘会用胡萝卜削一盏别致的灯，插上灯捻，注入豆油或花生油，让胡萝卜灯照亮简朴温馨的家。家人领受它的光明后，胡萝卜又会被炒了吃掉。有谁吃过“灯”呢，西王善村长大的这个孩子，就有这个福气。而从土壤中长出的“灯”，给了吕振生长的力气，也给了他审美的智慧。所以尽管来到大都市，他对故乡还是心心念念，在工作之余，勤奋笔耕，拾取那片土地的文学珍珠，以虔诚的手写方式，在悠长的回忆中，一笔一画，写就这本《望乡书》。




《望乡书》的作者署名是“雪野”，这是吕振为自己起的笔名，虽说在他的故乡，雪在冬天是精灵，难得一见，但正是这惊鸿之美，摄人心魄，令他有找到写作灵魂的感觉。

我与吕振并不熟，只在北京关于文艺工作的两次座谈会上匆匆见过。几年前他因公来哈尔滨出差，因为同行者中有我故乡的一位老友，老友说吕振比较喜欢我的作品，希望能见一面，结果我去宾馆看望他们时，吕振刚好出去了，错过了交流机会。这次他寄来《望乡书》的手稿，希望我能为他的新书作序，令我诚惶诚恐。因为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除了工作原因，不做任何形式的序言，主要是我能力和精力实在有限。但当我花了三个晚上拜读完这部散文集后，为他朴实的文字所打动，心有所触，愿意为雪野的文字写点什么，就算对这本书粗浅的读后感吧。

也许因为我的祖辈也来自齐鲁之地，所以我读《望乡书》时，有一种亲近感，因为很多风俗是相近的。比如他对红白喜事的描绘、对祭灶的描写等等。而且雪野的语言朴实，不乏诗意，有着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难得的一份稳健和赤诚，所以好像是在听一个人真真切切地讲故事，很容易走进文本。

《望乡书》共10章，每一章都有个主题，但无论主题如何细化，雪野笔到之处，无论是故乡的人，动物植物，还是风物，都脱不开一个“情”字，他的散文不干瘪，洋溢着动人的泥土芳香，这都有赖于他的情感浓度。他很自然地贴近了五味杂陈的生活，既拾取那天籁般的美好，也不回避它的落后和愚昧的一面。看到他捉鱼捉出了蟾蜍的描写，谁能不会心一笑呢！至于偷杏子和西瓜，放野火，捉知了，吃蚂蚱，挖荠菜，点燃玉米秆“照庭”，做游戏等洋溢着乡间浪漫情调的童年往事回忆，更像一杯杯醇酒，醉人心脾。但在《望乡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偷情的人，看到投井的妇女、自尽的姥爷，这背后也有着生活裂隙处那难言的绝望和孤独。作者对哑巴等弱势群体的描写，也投入了深深的同情。而当我读到他写的一个要饭的人的死亡细节时，更是深为震撼——“路边的水沟里，躺着一个人，穿着破衣烂衫，头发凌乱，胡子很长，一动不动。我们走近一看，他嘴角还叼着一截很短的灭了的烟头”，其中一个胆大的孩子拿起一块石头，向那人砸去，那人还是一动不动，但嘴角的烟头却被打落在地上。这样的描写，若非亲历，难以虚构。那截掉落的烟头，仿佛是坠向大地叩问死亡的一个问号，触目惊心。

雪野的根在故土，所以他比在城市长大的“80后”青年，多了一份天然的广阔和必然的沉重，这是他生命和事业的两翼吧。一个人缺乏自然的熏陶容易流俗，而一个人自幼年起就目睹生之艰难和死亡，在经历坎坷和挫折时，肩膀会自觉承担起重负。故乡是雪野最大的恩人，所以多年之后，他也回馈故土，把他的部分藏书捐赠给母校。

读《望乡书》，我知道雪野喜欢读韩少功、梁鸿、刘亮程等描写乡土的作品，他们也是我极为欣赏的同行。除了刘亮程，其实新疆还有位女作家李娟，她是当代散文天空的夜莺，不可多得的好作家。如果说雪野的散文还有缺憾的话，那么比之这些成就卓著的前辈作家，他笔下的乡土，虽然经过了文学的“反刍”，但还不够精深，个别章节枝蔓繁复，裁剪不当，我想随着阅历的增长，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毕竟他给我们奉上了一部心血之作，没有哗众取宠，踏踏实实走着自己的路。

一个手写故乡的人，他在对亲人尽孝的同时，其实也是用笔，在对哺育了自己的故土“尽孝”。这样的“孝心”永远是美德。

# 心里流淌一条大河

□秦湄毳

第一遍读邵丽的《黄河故事》是请田君老师用手机一页一页拍照传来图片给我，田老师拍得规规整整，我仔细读一遍，那33张图片里，蚁一样的小字写成的是一篇大文章，字小情怀大，一条大河蜿蜒着，我沉默沉思，什么东西那样庞大，让我没有言语。

小说写的是一段家族史，以给父亲寻购墓地为线索，围绕父亲这个中心人物，虚实并用写出一家人在时代的变迁里，生存、发展与向好的变化，大环境里演绎与时俱进的姐弟五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图景，是一幅场面宏大的画卷。故事的背景设置跨越南方和北方，郑州到深圳，是中原黄河岸的情牵系南海边吹拂的椰风，亲情的牵扯、国情的延拓，家的理想、国的宏图，个人的奋斗、政策的成全、时代的变迁、凡人的情怀、家与国的梦与想，小家庭逢上好时代、平常人遇见好机遇，滴水折射太阳的七彩光芒；一个家，一滴水，是浓缩的海洋、是抽取的标本。这是一滴水，更是千万滴水；这是一个家，更是千万家；这是一个故事，这样的故事有千千万。“父亲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也将葬身于黄河岸边”“我将完成的是我父亲未竟的梦想”，父亲的梦想，是黄河水一样，在流淌、在传承，这个父亲不止是“我”的父亲了，是许多个父亲，他的梦想，是黄河边无数的梦想，梦想是一条长长的河流。

图片在手机里，大河在文字里，文字在人的心里，流淌着，成为一条河，成为那条在大地上流淌着的大河。我以我的微渺，静观那安静流淌的声息，在天地之间。

收到书，我急切地想知道，那在手机上读过的33页之外的磅礴。为了更好地对照学习，我又网购了那本田君老师拍图给我看的选刊杂志。一薄一厚，薄薄厚厚间，文字的流转，胸襟的浩荡，作者的文字功夫、腾挪与铺排，我不逮旨义，只觉文字里天地之大，那一条大河，从纸页间到文字里，从书中到世上，从无形到有形，从有形回无形，来来往往，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从眼前来，到未来去，从远古来，到苍生炊烟深处去。我痴迷这大河的神妙，痴迷这红尘故事的平淡朴素与永恒。

作者讲述的故事，文字描写的家庭，是平常人家，是寻常事件与人物，其中意味，读着熟悉，掩卷深长。所谓“人人眼中有，人人笔下无”，是也；常言“是真佛只说家常”，信也。我喜欢这样的叙述语言，平静、安详、绵绵长长，续续然，悠悠闲闲地，不急不徐，如织如纺，没有断茎，没有堆累，质地似棉，那样的匀实，暖而熨帖，抚人心肺，是大地上来的，是百姓手里心里的，有机平稳，持久长远，属于苍生，是来自于大河流淌着的那葳蕤大地。

“能大”“能小”“能长”“能短”，作者一身好功夫在故事里显张力，“羚羊之角”在序与跋中隐约又明白，“我思故我在”“我手写我心”，眼里有笔下才有，心上有字间方有，大的文章出自于略大于整个宇宙的那一颗心灵。认知上去了，情怀境界辽阔了，作品焉能不意象汪洋。“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毕竟，那梦想之光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是很难发现的”。如果不曾经历玉碎的沉痛，怎么会有瓦全的超拔，如果不曾泥泞，怎会有突围而生的芳香，深渊下去，无底，下去，再下去，触了底，飞起来。

那草原多辽阔，那夜晚多黑暗，那黄河多弯曲，作者在那里哭泣过，哭过了，人也就焠过了，心也在荒原、在夜晚、在黄河里泅过了，泅水而来，不没就定会活出光彩，况且，文字这样加持于她！祝福每一个泅出黑暗、泅出弯曲、泅出无边荒原的人，一如黄河故事里的一家人，一如黄河岸边还在岁月的故事里行走着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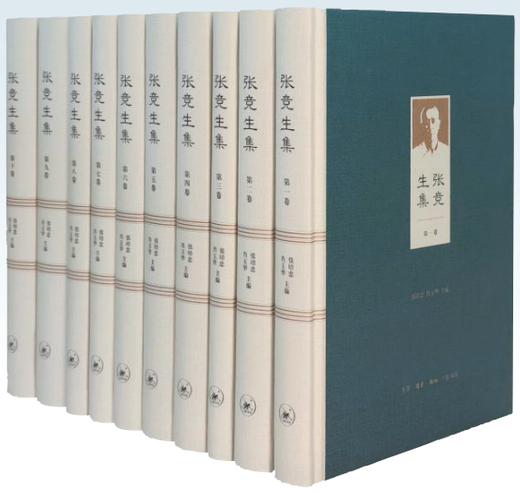
心里流淌着一条大河，是作家，自会写出大作品。哪一行哪一业的人，只要心里流淌着一条大河，生命就会怀有大河的磅礴。不信，你看《黄河故事》，那小人物，那大情怀，家与国，在心上，在日子里；国与家在寻常日子里，这是黄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这大河流淌向世界的海洋。

作为革命者、学问家和社会实践家，张竞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曾是孙中山任命的南北议和团秘书。他在北大任教时，协助李大钊开展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等革命工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广东饶平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致力于乡村振兴。由张培忠积30年之研究、收集和整理之功，会同孔令彬、肖玉华等拾遗、编校，由陈春声、陈平原、林岗担任顾问，三联书店近日出版的十卷本《张竞生集》，全面反映张竞生的革命生涯和学术成果，是努力挖掘潮汕文化的实际行动，特刊发该书后记，以飨读者。　——编　者

# 一瓣馨香贻后人

## ——《张竞生集》出版原委

□张培忠　孔令彬




编一套搜罗宏富的张竞生著作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怎么编的构想也随着张竞生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渐清晰。尽管之前已有《张竞生文选》（内部读物）和《张竞生文集》（上下卷）陆续印行，但真正的张竞生全集出版仍假以时日。2008年3月，为了给耗时近20年研究、创作并即将出版的长篇人物传记《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预热，经时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李昕同意，传记作者张培忠选编了《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辑录张竞生20世纪50年代在海外出版的三部自传体散文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爱的漩涡》，由年轻编辑徐国强担任责编。没想到这本投石问路的张竞生随笔选，一经推出就大受读者青睐，出版数月随即重印，并迅速登上三联书店畅销书榜。受到这种“红火”局面的鼓舞，张培忠于2008年7月22日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的邮件中首次提出了“说服三联出版张竞生作品系列，计划以‘1+10’或者‘1+13’的方式进行。1是《张竞生评传》（暂名），10是10本张竞生的作品，3是3本翻译作品，今年已出《浮生漫谈》，最近可出《美治主义——张竞生美学文选》《乡村建设——张竞生乡土文选》《南北议和——张竞生回想录》等”。在当天回复的邮件中，陈教授直截了当地对张培忠说：“这计划不太可行。”并指出“不是说张书不值得重刊，而是不能单靠市场支持，应该走‘文化积累’或‘学术建设’的路子”，建议张培忠“最好在广东找学院中人合作，申请科研经费，做正规的资料收集、整理、校勘，编一套好的《张竞生文集》”。当时张培忠一方面一时半刻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另一方面还心存幻想，遂于2009年10月、2011年2月选编并先后在三联书店出版了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爱情定则》等。2010年1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培忠选编的《美的人生观》插图本。此外，张培忠还邀请长期从事法语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莫旭强先生翻译张竞生用法文完成的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并于2012年8月在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选编张竞生分别完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食经》《新食经》，同年7月在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2013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钟永宁约请张培忠编选张竞生全集，交该社出版。张培忠拟定了一个共15卷的张竞生作品系列，包括：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美治主义——张竞生美学文选；乡村建设——张竞生乡土文选；情感主义——张竞生文学文选；性育丛谈——张竞生性学文选；普遍的逻辑——张竞生哲学文选；爱情定则——张竞生爱情文选；新食经——张竞生美食文选；南北议和——张竞生回想录；新文化论——张竞生主编《新文化》文萃；卢梭教育论——张竞生博士论文；忏悔录——张竞生翻译文选；多惹情歌——张竞生翻译文选；梦的解析——张竞生翻译文选；满街争说张竞生——名人论张竞生。半年后，钟永宁先生调往花城出版社任职，这个计划便不了了之。在此过程中，张培忠也多次与徐国强探讨由三联书店独力承担出版《张竞生全集》的可能性，由于资金和人力的限制，这个愿望也搁浅了。实践证明，陈平原教授10年前的预见充满文化建设的真谛和学术操持的智慧，是完全正确的。

2016年底，韩山书院开完“丘逢甲与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后，“岭东人文研究中心”决定把目标转向更为艰巨的任务，即集合韩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乃至社会力量来共同整理并研究潮汕先贤张竞生博士的著作，为2019年张竞生诞辰130周年纪念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书院执行山长李伟雄说起少年时曾在“文革”批斗现场见过张竞生的场景，至今仍觉历历在目，而孔令彬和赵松元院长也各自于10多年前都曾拜访过张竞生的故居，对这位潮汕地区民国第一位哲学博士既充满了好奇，也深怀敬意。项目确定下来以后，就由孔令彬做了牵头人。

在专程去饶平黄冈拜会了张竞生的次子张超先生并获得他的支持后，2017年春天，孔令彬与李伟雄山长、赵松元院长两上广州，专门拜访了对张竞生研究倾注20多年心血的张培忠。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2019年需要用一套比较完整的张竞生作品集来纪念其诞辰130周年，并召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议，来进一步宣传和推动张竞生的研究。两次会谈，除了讨论《张竞生集》的顾问、编委会组成、出版社事宜外，还就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及如何借此推动饶平县政府重视张竞生故居的修缮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由张培忠担任文集的主编，从总体上指导接下来的编纂工作。之后，由于出版经费数额较大，一直无法落实，而编委会只能按兵不动，先熟悉一些张培忠馈赠的相关书籍材料。

转机出现在9月，项目得到了韩山师范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从省市共建资金中解决了出版经费问题。于是，孔令彬与李伟雄、肖玉华等第三次上广州拜会张培忠，张培忠、孔令彬分别代表甲乙双方签订了“关于编辑出版《张竞生集》的合作协议”，协议规定甲方提供《张竞生集》基本稿件、拟定文集的基本框架，负责与张竞生先生家属联系的一切事宜，包括洽谈免除稿费以减轻出版负担、授权出版以及负责与三联书店联系的一切事宜；乙方承担出版所需资金，负责对文集分卷内容进行文字校对、编辑、录入、访书，委派各分卷主编以及其他相关事务；正式成立编委会，聘请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林岗教授担任顾问，全面启动了《张竞生集》的编纂工作。

从广州返回潮州，分卷主编领取各自的任务和材料，在编委会上讨论了几条文字录入时的大体原则，便开始了紧张的录入文字工作。其时难度最大的仍在文献的搜集方面。既然是要做全集的打算，并且也许就只有这一次机会，本书顾问陈平原和北京三联的负责人均说了这样的话，使具体负责后期资料收集工作的孔令彬深感压力之大。尽管主编张培忠业已提供了大部分张竞生作品，包括从法国里昂图书馆找回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张竞生博士论文等，但要达到编撰全集的最低目标，也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更遑论一网打尽的更高要求。

张竞生几乎从来不使用笔名，只署名“张竞生”“竞生”“竞”等，这就为我们在作品搜集时减轻了不少甄别的困难。再者，借助今天高度发达的网络资源及各种数据库，足不出户，已可解决许多前人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外，借助朋友圈，通过微信、邮箱等平台方式，我们把张竞生曾经生活或居住过的地方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潮汕、台湾等地的朋友，都链接了起来。这一年来，在微信和邮箱中不时阅读传来的新发现，竟成了我们一种极快乐的享受。当然，还有大量材料的发现只能采用传统的手段，即到各地的图书馆去访查。北京、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图书馆是我们多次访问的地方，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图书馆一直未能亲去查看，虽有朋友帮忙，仍留下许多的遗憾。

在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哪怕是亲临，仍感受到许多的遗憾和缺憾。如一些老报纸虽有存世，但由于保存不善，无法翻阅。中山大学珍藏馆的《群声报》，就仅能翻看一小部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上海夜报》由于损毁严重则被告知完全无法查阅。尤让人痛惜的是潮汕地区的老报纸、老杂志，百不存一。张竞生第一次回国执掌金山中学，乃至后来几次乡居，前后时间长达20余年，其在地方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皆因多数报刊不存而成永远的遗憾。有时即使那些保存下来的老报刊，也多是断简残编，如不少连载文章，中间缺几期乃至被人剪掉开窗都十分常见。至于作者的书信、手稿，随着1953年作者一家彻底离开旧寨园到广州，被后来的各种运动损毁殆尽。1961年后，张竞生再次返乡居住近10年，去世时也因无亲人在跟前，所有遗物散失严重，成了永久的损失。此外，张竞生因《性史》一书备受争议，其著作被禁毁现象十分严重，也为资料的搜集带来了障碍，有时为了访查一部著作的原版，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亦难觅踪迹。

访查搜集资料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逐渐辨伪的过程，其间有喜也有悲，很多时候是悲喜交集，有一得就有一失，最后总能把所存疑惑弄清楚。如张竞生的生年问题：传统认为是1888年，而经过我们的缜密考证则更定为1889年，就是我们此次搜集整理资料的收获之一，还有其他几个时间节点对学界传统观点的修正，都载在肖玉华博士修订的张竞生年谱中。至于张竞生的著作辨伪，就目前编者所知，假借张竞生之名发表的文章比较少见，仅有《幻洲》半月刊上一篇《论小衫之必要》，不仅属于假冒，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嫁祸。而冒名张竞生的著作类却十分多，《性史》第一集之后的许多续集乃至《性艺》等，已经张竞生本人辩驳，其他假冒张竞生主编或著述的性书在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十分流行，如《性考》《性美集》《欲情爱火》《对待女子妙术》《爱的丛书》《热情的女人》等。甚至于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励力出版社还曾假张竞生之名出过如《女人的引诱》《性的原理》《爱的结果》《性的知识》等书籍，编者均不辞辛苦从海外求来原书扫描件。另外，还有一种盗版张竞生著作的现象，如1928年由美的书店发行的《爱情定则讨论集》，后被无良书商改名为《如此恋爱》《新杏花天》等名字盗版印行。此外，也有人认为属于张竞生佚作部分的《我的婚姻》《恋爱的卫生》等书，经我们的考证也均属子虚乌有。

出版《张竞生集》，是广东学术界、出版界、文化界的盛事。为了把项目实施好，2018年4月7日，《张竞生集》编委会扩大会议暨张竞生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会在潮州市韩山书院召开。陈春声教授、陈平原教授、林岗教授三位顾问，韩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幸小涛，《张竞生集》编委会全体成员，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省档案馆、韩山师范学院、饶平县委等单位代表30多人出席会议。会上，幸小涛书记致欢迎词后，张培忠汇报了编辑出版《张竞生集》的缘起构想，孔令彬汇报了文献搜集校注情况、肖玉华汇报了各分卷编辑情况；陈春声书记从政治把关、陈平原教授从学术规范、林岗教授从具体细节等方面提出意见；三联书店副总编辑郑勇、三联书店文化分社社长徐国强分别从出版的角度和责编的角度提出具体要求。会议临近结束时，张培忠建议陈平原教授为《张竞生集》撰写总序，大家纷纷鼓掌表示赞成。

会后，各项工作的进度进一步加快，而全书在体例方面，充分吸收了三位顾问的意见，尤其平原老师的建议，每卷均先专著后单篇，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随着资料搜集的深入，全书各卷内容也在做适当的调整，如合并了一些早期的分卷内容，增加了第九卷“杂卷”和第十卷“评论回忆”等方面的内容，第九卷还临时决定加入一份张竞生的年谱简编。至于原计划中的目录索引、人名索引等，因时间关系，实在无法按时完成，只能暂付阙如。

在文字录入方面，我们亦约定了几个原则。其一，使用新式标点。民国时期标点符号的使用与今天自有许多不同，录入时则一律改成新式标点。一些报纸文章一逗到底的情况，各卷主编根据文意斟酌修改。其二，校正错别字。民国时的报刊普遍存在错别字问题，我们的处理是直接在原文上改动，不再标识原文错误文字。有些民国时期的特殊别字，则尽量保留原貌。其三，模糊残缺处文字以“□”代替。整理录入文字时，若遇到报纸、杂志文字模糊不清或残破不齐等问题，所缺文字一律用“□”符号代替。其四，繁简字转换问题。本书全以简体字录入，由于繁体字、简体字并非一一对应，尤需提醒各位分卷主编注意。如“餘”对应“余”或“馀”，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则仍用“馀”字。其五，外国文字、图表、插图等信息的录入。外国文字、字母符号大小写应确保准确无误，图表、插图等信息建议以扫描形式存其原貌，交由出版社处理。其六，为确保文集质量，文字录入时尽量以文章出版或发表时的原件为参考对象，即使那些已经被整理出版过的专著和文章，我们也要查找到原文并核对无误。以上是文字录入的几个原则。至于注释方面，则一律采用页下注形式，每页重新编排，注释要求尽量简洁。为确保注释信息的准确性与分布的平衡，由本文集第二主编肖玉华博士负责对注释进行统一修订，且力避重复。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照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的新征程中，编辑出版《张竞生集》，可谓欣逢盛世，正当其时，既告慰先贤，又启迪来者，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特为之记。